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述评

吴广义

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再次判定东史郎败诉。这起东史郎诉讼案,从东京地方法院开庭一审,到这次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历时5年零8个月,竟然判定在以《阵中日记》为蓝本撰写的《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如实记述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一起虐杀无辜中国人事件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有罪”,强令东史郎向那个杀人凶手、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赔偿名誉损失”、“登报谢罪”。综观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和发人深省。

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不公正判决

桥本光治一伙是把发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邮袋杀人事件”作为民事诉讼状告东史郎的,东京地方法院也就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进行审理。这样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出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定案以来第一次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翻案目的的闹剧。

东京地方法院于1993年4月26日开庭,经过整整3年的“调查论证”和10多次庭审,于1996年4月27日竟然置历史事实于

不顾，以东史郎和青木书店等在出版物中的记述“没有客观证据”，“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为由，判定东史郎等败诉，责令向原告赔偿50万日元，并登报谢罪。判决中公然宣称：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杀害俘虏和平民也许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但是，被害人数、被害者遭到杀害的原因和现场的具体情况等，在历史学上尚有许多争论”。这个论调的实质就是“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当东京地方法庭宣布判决之后，桥本光治的支持者身着旧军服，走上街头，高唱军歌，为“胜利”欢呼。显然，这一判决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气焰。

东史郎随即上诉东京高等法院，要求撤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的错误判决。

1996年9月26日，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东史郎上诉案；1996年12月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1997年2月6日，第三次开庭审理……经过13次开庭调查和辩论，1998年9月8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将于1998年11月26日进行终审判决。可是11月7日，东京高等法院突然通知东史郎，终审判决推迟到12月22日，理由是“准备判决文书需要充分的时间，还需要东史郎提供5本《阵中日记》作为判决的证据”。东史郎认为这些都是托词，推迟判决的真正原因是东京高等法院对即将作出的不公正判决感到心虚，故意避开在中国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宣布。

1998年12月22日下午1点30分，大批旁听者聚集在东京高等法院民事审判庭外，其中大多是支持东史郎的日本民众团体和人士，也有专程前来采访的南京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台的记者，以及中国留日学生。2点钟，经过抽签，一部分旁听者获准进入法庭。2点10分，审判长奥山兴悦、审判员都筑宏、杉山正已进入法庭。面无表情的审判长奥山兴悦匆匆宣布：“被推认为不存在东史郎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驳回被告东史郎上诉。”东史郎以及出版《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

南京大屠杀》等书的青木书店和编辑下里正树全面败诉。宣判瞬间结束,在场的东史郎及其支持者们一时都愕然了。

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事务局长山内小夜子和东史郎诉讼案辩护团团团长中北龙太郎感到震惊,他们在上诉的两年多时间里,搜集并提交了确凿的证据,足以推翻东京地方法院的无理判决。针对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的理由,即“东史郎在《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中写的,桥本光治干那种把中国人装进邮袋里,浇上汽油,捆上手榴弹,拉了弦以后,推进水塘里的危险行为,会伤害桥本光治自己,是没有道理的,实行是不可能的,因此那是谎言;邮政口袋不可能装进一个人;南京中山路是一条繁华街道,南京最高法院对面不可能有水塘”,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和辩护团专程来到南京,请爆破专家模拟当年的场面,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证实桥本光治在将挂着手榴弹的邮袋扔进水塘以后,能够及时脱身,不会受到爆炸弹片的伤害。南京公证处还提供了6名证人,证明当时南京最高法院对面确实有水塘的保全证言公证、明确显示南京高等法院对面有水塘的当年南京航拍地图实物公证,以及能够装进一个人的当年邮政口袋实物公证。东史郎诉讼案辩护团将这些证据和公证都提交给东京高等法院。而东京高等法院这次二审竟借口“时间已经经过数十年,实验无法完全重复过去的实态”,对手榴弹爆炸试验证据蛮横地予以拒绝,对其他客观证据也不予采纳。

东京高等法院在陈述判定东史郎败诉的理由时,特别使用了“被推认”的措词。这就意味着法官不是以东史郎当年战地实录的《阵中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辩护团提供的客观证据为依据,而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推断来定案,司法的准则和法律的尊严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

右翼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

在一审过程中,桥本光治一伙主要是在“邮袋杀人事件”上大做文章,千方百计抹煞史实,开脱罪责。当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无理判定东史郎败诉后,桥本光治一伙的气焰更加嚣张。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期间,他们多次以原告补充证据为名,向法庭书面提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和推卸侵略战争罪责的种种谬论。

针对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将7000名战俘平均每个中队分二三百人加以屠杀”之事,桥本光治一伙声称,“屠杀7000名俘虏之事是不存在的”;“1万人左右的战俘,17日晚收容在南京城内的监狱中,之后一半人被送至上海,剩下的一半被编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军”(见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六》、1998年5月12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八》)。然而,桥本光治一伙关于将1万名俘虏的一半送至上海的理由、方法以及在上海的处置,均提不出任何证据。汪伪政权是侵华日军直到1940年3月才扶植起来的,桥本光治一伙声称日军将1万名俘虏的另一半“编入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军”,那就需要将这样大批的俘虏羁押两年零三个月。监管的地点、部队和具体情节,桥本光治一伙却提不出任何证据。

显然,桥本光治一伙在编造谎言,是右翼分子妄图掩盖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故伎重演。当年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以后,即蓄意缩小俘虏数字,以掩盖其大规模屠杀俘虏的罪行。1937年12月18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公布的综合战报称“俘虏仅有数千”(见[日]洞富雄著:《定本 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1982年版)。而原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松井石根开脱南京大屠杀罪责的宣誓供词中则称:“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5000名,

这些俘虏没有被屠杀,据两军的报告,妥善地释放到了长江对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214号)

这里仅举出两张图片,足以证明“俘虏仅有数千”纯属谎言。一张是满铁发行的《满洲画报》昭和十三年(1938年)2月号《南京攻略特辑》中的一幅图片,画面显示被日军捕获的密密麻麻的人群,其右下角的说明文字是“改换便衣准备逃跑时被捕获的一万五百名俘虏(12月14日)”。众所周知,满铁同日军密切勾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此次日军攻略南京,满铁派出特务班随同前往,这张照片只是实地拍摄的许多图片中的一张。另一张是日本随军记者上野12月16日拍摄的照片,附带的说明为“被两角部队收容在南京城外村庄的俘虏的一部分”。关于两角部队(即第十三师团一零三旅团第六十五联队,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这次抓到的俘虏的总数,随军记者横田在《东京朝日新闻》12月16日的报道说:“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14777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

至于日军真的将俘虏都释放了吗?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日军于攻陷南京后有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了大量俘虏。

下面仅举两条史料:

东史郎所在部队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即日军攻陷南京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树林中和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而对于1000人、5000人、1万人之众,解除全部武装都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这帮人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收拾。故而用卡车增派部队,对其进行监视,并担任诱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这种处置非当初预料所及,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个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

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俘虏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二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采自 南京攻略战·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见 历史 and 人物——秘史? 太平洋战争》1984年版)

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提到的处理掉约15000名俘虏的‘佐佐木部队’就是第三十旅团,旅团长是佐佐木到一少将。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中写道:

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人的轻装甲车在上午10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扫射在江面上逃跑的敌人,大约打完了15000发子弹……那天,在我支队(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旅团亦称为支队)区域内,敌人弃尸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加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下午2时,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部队,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采自佐佐木到一:《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补版),日本劲草书房1967年版)

前面提到的日军两角部队抓到的 14777 名俘虏,于 12 月 16、17 两日在长江边被集体屠杀。在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的《把南京大屠杀记录下来的皇军士兵们——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即一零三旅团,旅团长山田 二少将)士兵的 阵中日记》(日本大月书店 1996 年版)一书中,收录了该部队 19 名官兵的《阵中日记》,明确记录了这起大屠杀以及 18、19 两日将尸体抛入江中,毁尸灭迹的过程。旅团长山田 二在战地《笔记》中写道:“12 月 14 日,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15 日,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16 日,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18 日,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19 日,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见[日]洞富雄著:《定本南京大屠杀》,日本德间书店 1982 年版)这些来至凶手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日军攻陷南京后采取了大规模屠杀俘虏的恐怖政策。

桥本光治一伙在法庭上提出:“说许多女性、儿童、老人被害是南京之战的特点,完全与事实相悖。”(见桥本光治方面 1997 年 11 月 13 日交付的《难备书面六》)下面仅列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几段自白,证明桥本一伙之语纯属谎言。

一个曾是东史郎所在部队士兵的日本老人在回忆其参加的南京大屠杀时说:“在武进(现为常熟)我看到的。日兵发现了藏在屋里的母女两个人,叫喊着‘干这个姑娘!’就要上前动手。母亲用身子挡住女儿,敞开自己胸前的衣服,想用牺牲自己的方法来帮助女儿逃脱厄运。日兵将两个人的衣服全都剥光,5 个日本兵将她们轮奸了。随后,日兵将母女两个拖到河边,将中国兵残留下来的手榴弹硬塞进两个人的胯裆里。‘嘣!’手榴弹爆炸了,母女两个从肚脐以下都被炸没了。”([日]下里正树:《续被隐瞒的联队史——机关

枪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日本青木书店1988年版）
日军士兵冈本健三回忆说：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以后，情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面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知道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出钱去买。（《参加杭州湾前敌登陆》，载《中国》1971年8月号）

原为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炮小队炮手的东口义一，1945年8月被俘。他在笔供中写道：

1937年12月14至16日，在南京城中盘踞时，小队长市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开会议，为了在会后的会餐会上将中国妇女作为小队的慰安妇，对村田军曹做了指示。为此，村田军曹指挥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国民房，谎称让妇女洗衣服，抓了10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在刀枪监视下，强制地由小队全员60人进行了轮奸。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对25岁和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进行了两次轮奸。宿舍变动时，把她们留在那里而离开了。

（采自东口义一笔供，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来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则证明攻入南京的日军士兵完全是一群披着军装的野兽。现住南京的夏淑琴老人回忆说：“1937年，我才7岁，住中华东门，全家有祖父母、父母和5

个孩子共9口人。12月13日午前,日本兵闯入我家,当即将开门的父亲枪杀了,接着杀死了几个邻居。母亲和小妹妹、邻居家的阿姨及其男孩、女孩共5人藏在桌子底下,日本兵发现后,将妹妹杀死,将母亲强奸后刺杀了,邻居阿姨强烈反抗,连同她的儿女一块被杀害。日本兵又找到后屋,祖父母和我以及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藏在那里。祖父在门口被杀死。日本兵要强奸姐姐,祖母拼命阻拦,也被杀死。大姐姐才15岁,被按在桌子上强奸了,二姐姐只有13岁,也被强奸了。两个姐姐都被杀死。我害怕极了,藏在床下面,日本兵用刺刀扎我,至今还留着伤疤。”(见中央档案馆等编:《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随后,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吉和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赶到现场,马吉用摄影机拍下了尸横遍地的镜头。(见中央档案馆等录制的纪实文献录像片《南京大屠杀实证》,中国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1995年版)

桥本光治一伙声称:“日本兵不可能放火妨碍露营,因为放火会失去露营地,绝大多数放火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进入南京后日本兵无放火行为。”“为了栽赃日本军,中国军在撤退时故意放火、掠夺、强奸和杀害市民”(见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六》)。下面列举当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记录,足以揭穿桥本等人的谎言。

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美籍牧师费奇在其《自传》中留下了当年的记录:“12月19日,整天混乱,发生了多起大火,都是由日本兵故意点燃的。许多房屋在一天之中被侵犯5至10次,人们受到抢劫,妇女遭到强奸,许多人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被杀害。安全区某处有清洁工7人,其中6人被杀,1人负伤潜逃回来,告诉我们经过情况。史密斯和我再次拜会日本大使,呈递一份已被证实的安全区内55件日军暴力事件,并告诉日本大使田中和总领事富古伊,今天是最为严重的一天。我们得到保证,他们将尽‘最大努

力’，使事态‘不久’得以好转。这一切都很明显，他们对军部毫无影响力，而军部对士兵也毫不控制。”〔美〕费奇：《我在中国八十年》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这一天的《阵中日志》中写道：“午后带幕僚数人登上清凉山（位于南京城内中央地带，在山顶可俯视城内外）及北极阁，观望南京城内外的形势。”（采自田中正明《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日本芙蓉书房1985年版）证明作为日军战地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完全掌握和了解南京的局势，对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暴行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代表人物田中正明编的《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志》，虽然做了900多处删改，还是留下了这条文字资料，并且配有一幅松井石根在清凉山上用望远镜视察南京城内外情景的照片。仅这一条文字资料和这一张照片既可以推翻松井石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以有病为借口，声称‘对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谎言，也可以推翻桥本光治一伙声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的定罪，是“夸大其词，罗列罪状”（见桥本光治方面1997年11月13日交付的《准备书面六》）的谎言。

以上表明，桥本光治一伙制造的谎言破绽百出，而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无疑是认可和支持了这些谎言，助长了桥本一伙的气焰。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一结束，桥本光治一伙就迫不及待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会场的正面，悬挂起一个大横幅：“南京大屠杀虚构审判胜诉。”中国记者质问原告律师高池胜彦：且不说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如何不公正，单就这次判决仅仅涉及南京大屠杀期间一起虐杀暴行是否属实而言，何以断定法院已经判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虚构”的？高池胜彦无言以对。另一位中国记者问他自己是什么观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桥本光治一伙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演”，可谓原形毕露。很明显，右翼势力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以否定一个虐杀事件为突破口，进而否定东史郎及其战友们的许许多多的《阵中日记》的真实性，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早已成为定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的第二天，即12月23日，恰好是日本战犯东条英机50年前被绞死的日子，600多人在当年处决东条英机的巢鸭监狱遗址举行“追悼仪式”，并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纪念馆”，为这个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平反昭雪”。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扬言：“必须抹去我祖父身上的灰尘，向后代传授真实的历史。”

右翼分子对东史郎的住宅不断骚扰，恐吓电话接二连三地打到东史郎家中，东史郎不得不申请警察保护。

1999年1月8日11时40分，一个日本右翼青年手持金属棒闯入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青木书店，一边高喊“为什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书”，“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一边砸毁书架和办公桌，直到警察将其逮捕。据警察调查，该青年名叫横田进，年仅23岁，家住神奈川县厚木市，系右翼团体成员。他于7日两次闯入青木书店编辑部，质问“为什么出版南京大屠杀的书”；8日他又到青木书店，要求直接同青木书店老板青木里人见面，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在店堂内大打出手。

日本青木书店是一个有50年历史的出版社，长期以来主持正义，正视历史，出版了一批客观记述日本侵华历史的书籍。1985年就翻译出版了中国南京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的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证言 南京大屠杀》。1987年，出版东史郎的《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随后出版下里正树根据东史郎所在部队官兵《阵中日记》等原始资料撰写的《被隐

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续被隐瞒的联队史——机关枪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印证了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1989年出版井口和起等编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有关资料集》，1992年出版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1998年出版藤原彰编的《怎样看南京事件》，等等。这些书客观地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对于妄图掩盖和抹煞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本右翼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96年4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和青木书店败诉后，青木书店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以新装版的形式再次发行，以表示支持东史郎法庭斗争和坚持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决心。因此，青木书店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右翼青年砸毁青木书店店堂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东史郎坚持斗争到底

东史郎听到自己再次败诉的宣判，心情异常沉痛。他几十年来背着“必须从心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今又要因反省和证实南京大屠杀暴行而遭受日本法院的无理判决。这位86岁的老人陷入沉默和痛楚之中。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后，东史郎及其支援会、辩护团也在当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东史郎举起一张纸，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审判不公，天理难容！”以表达对法院不公正判决的严正抗议。他感慨地说：“当年日本不仅在侵华战场上打了败仗，而且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德报怨’，和平遣返日军战俘和日本侨民，在道义上也打了败仗。如今日本法院不愿意正视和承认日本侵华历史，在道义上又一次打了败仗！”他表示：为了反省那段日本侵华罪

恶历史,为了驳斥桥本光治一伙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要坚持斗争到底!

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和辩护团代表东史郎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

今天,东京高等法院继三年前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又置国际上已有定论的历史事实于不顾,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通过此案的审理,已经一目了然。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从根本上践踏了历史的尊严。

这一诉讼案的原告方,企图借助法庭来恫吓日本侵华历史的见证人,阻碍他们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蓄谋将南京大屠杀“虚构化”。他们甚至宣称当年南京发生的放火、屠杀等暴行都是中国军队所为,这些论调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

我们对于东京高等法院在“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的压力下,作出这样的极端政治化的判决,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不接受这样的判决,要立即向最高法院上诉,要不断地更广泛地将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真相向世人公布。我们期待着符合历史事实的审判。

当天晚上6点30分,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在东京饭田桥一会议厅举行报告会,100多名支持者参加。在会上,评论家津田道夫作了主题讲演。他指出:东史郎诉讼案之所以会出现一而再的错判,其根源是日本目前还不敢正视自己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不愿意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出版美化侵略战争的书籍;日本法院对于中、韩、英、美等国受害者的对日索赔,除给予3名韩国慰安妇极少的赔偿外,都予以驳回;等等,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在当前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愈演愈烈之际,判定东史郎败诉决不是偶然的。而这一诉讼案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是两个日本老兵为了论证一起60年前虐

杀中国人的暴行而对簿公堂,实质则是妄图推卸罪责的日本右翼势力策划和导演“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代理人战争”;原告方的用心是妄图把“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这一荒谬的历史观让法院代表国家予以承认。与会者纷纷表示:历史不容篡改,罪责不容抹煞!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一定要支持东史郎,同右翼势力斗争到底!

东史郎于12月25日上诉日本最高法院,要求撤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的不公正判决。日本进步组织和人士继续支持东史郎的正义斗争。

东史郎二审败诉后,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立即着手筹备“东史郎见证南京大屠杀展览”,发起“尊重南京大屠杀史实,要求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签名运动”,呼吁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声援东史郎的上诉行动。

提起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自然会想到它的“总管家”山内小夜子女士。山内毕业于京都大谷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在日本真宗大谷派的研究所从事宗教学研究,发表多篇论文,主张追究当年日本宗教帮助军部和政府,煽动军国主义狂热的罪责,提出日本要进行信仰革新,并且指出日本宗教精神重建的方向。1988年她听说东史郎反省和忏悔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事迹后,找到住在丹后半岛的东史郎,从此开始了支持东史郎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斗争,并自称是“与东史郎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1996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后,山内立即发起组织了“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出任该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长,支持东史郎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定期出版会刊《自省而非“自虐”》,通过会刊宣传东史郎证实和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意义,报告东史郎诉讼案的进程和辩护团取证情况,发表声援东史郎和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的文章。山内陪同东史郎奔波于京都、东京、大阪等地进行南京

大屠杀史实见证报告,多次携辩护团来南京取证。

1998年11月1至5日,也就是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前夕,山内陪东史郎来到北京,参加“东史郎见证南京大屠杀系列活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出版座谈会”上,东史郎反省了自己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煽动,从一个善良青年变成杀烧淫掠的侵略士兵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举办的“日军侵华罪行报告会”上,东史郎忏悔了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再三向中国人民谢罪;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学生在书写着“还历史真实,伸人间正义”10个大字的条幅上签名,并将它送给东史郎,以表示支持他的正义斗争。

近年来,随着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愈演愈烈,日本不断发生右翼分子袭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进步人士的事件。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后,山内不仅申请丹后半岛警察署对东史郎给予保护,而且每当东史郎外出活动时,都不顾自己安危,紧挽着东史郎的手,时刻防备发生意外。山内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都称她为“女东史郎”。

对东史郎支持最大的,还有在东史郎带动下反省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的原日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前,一些东史郎的战友和战友的遗属纷纷拿出珍藏多年的《阵中日记》等证据,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真相,证明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杀烧淫掠等残暴行径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和普遍发生的战争罪行。

二审判决前后,东史郎收到了许多支持他的信件,其中仓桥绫子(原名大泽绫子,出嫁后随夫姓)女士的信中写道:父亲生前由于没有东史郎先生那样的勇气,没能亲自前去中国公开向中国人民谢罪,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内疚去世。临终留下遗言,要在自己墓碑上铭刻永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忏悔。仓桥女士随信附了其父大

大屠杀史实见证报告,多次携辩护团来南京取证。

1998年11月1至5日,也就是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前夕,山内陪东史郎来到北京,参加“东史郎见证南京大屠杀系列活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举办的“《东史郎诉讼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出版座谈会”上,东史郎反省了自己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煽动,从一个善良青年变成杀烧淫掠的侵略士兵的经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举办的“日军侵华罪行报告会”上,东史郎忏悔了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再三向中国人民谢罪;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学生在书写着“还历史真实,伸人间正义”10个大字的条幅上签名,并将它送给东史郎,以表示支持他的正义斗争。

近年来,随着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之风愈演愈烈,日本不断发生右翼分子袭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进步人士的事件。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后,山内不仅申请丹后半岛警察署对东史郎给予保护,而且每当东史郎外出活动时,都不顾自己安危,紧挽着东史郎的手,时刻防备发生意外。山内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人们都称她为“女东史郎”。

对东史郎支持最大的,还有在东史郎带动下反省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的原日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前,一些东史郎的战友和战友的遗属纷纷拿出珍藏多年的《阵中日记》等证据,揭露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真相,证明东史郎《阵中日记》所记杀烧淫掠等残暴行径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和普遍发生的战争罪行。

二审判决前后,东史郎收到了许多支持他的信件,其中仓桥绫子(原名大泽绫子,出嫁后随夫姓)女士的信中写道:父亲生前由于没有东史郎先生那样的勇气,没能亲自前去中国公开向中国人民谢罪,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内疚去世。临终留下遗言,要在自己墓碑上铭刻永远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忏悔。仓桥女士随信附了其父大